

● 哲 学

阳明心学养成理论的现代价值

夏 澍 耘

(湖北三峡学院“两课”部,湖北 宜昌 443000)

[作者简介] 夏澍耘(1968-),女,湖北宜昌人,湖北三峡学院“两课部”讲师,主要从事伦理学教学与研究。

[摘 要] 阳明心学的核心和精华在其养成理论。阳明心学的养成理论,对道德养成的知、情、意、行各环节已展开详实的探球,尤其对道德养成由知达行的“后半截”提出了诸多颇有价值的观点。回采和借鉴阳明心学的养成理论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也极具现实价值。

[关键词] 王阳明;养成理论;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B 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4-0475-05

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伦理学史上一个重要学派,曾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产生过广泛、深刻的影响。虽然其理论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封建主阶级的统治利益,但它毕竟综合了伦理史上多方面的资料,在其伦理领域也形成诸多创造和发展,其中尤以其养成理论既是其全部学说的核心和精华,又是阳明心学中最富有现实价值与活力的部分。

和大多数宋明理学家一样,王阳明也是借助于《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他尤其注重运用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作为其修养论的五个主要环节,并分别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涵赋予新的心学解释,形成了以“致良知”为核心、以“知行合一”为落脚点的独具特色的养成理论。

(1)关于“格物”。所谓格物致知,乃是宋明理学家们的老生常谈。但对格物致知的解说,却存在很大分歧。朱熹也讲“格物”,朱子解“格”为“至”、“尽”之意。《朱子语类》中云:“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只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到十分,方是格物。”王阳明认为:朱熹之“格物”不仅犯

了“析心与理为二”的错误,而且它要求人们格尽天下之物是不可能的。更为严重的是,朱熹之“格物”解决不了自家诚意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王阳明把天、道、理均通过性而归结于人心,从而得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格物”只在格心正物的结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1](卷二十六)。“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1](卷二)。由此可见,阳明之“物”是“意之物”、“心之物”,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事物存在,而是介入了主体精神与主体活动的行为物;阳明“格物”之“格”乃是要求主体通过自我意动的某种特殊机制(为善去恶)促成自我本质精神之强化;阳明的“格物”是主体精神的“格物”或言格心正物,是主体以本家自心去映照、对待万事万物,将本能的良知赋予日常生活中的事事物物,使之获得此天理良知,以归于正,即:“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1](卷二)。

总的说来,王阳明从主体精神的“格物”开始,形成的是一条由内而外的修养途径,从而也形成了阳明与朱熹一个重内、一个重外两相差别的两种修养论。但是,在阳明的格物说中,却把主体的需要混同

为客观事物本身,把主体之“格”混同为客体之“格准”,否定了事物质的外在客观性。

(2)关于“致知”。阳明修身五环节之二“致知”是以“致良知”的命题而展开。王学的最大特色与贡献就在于“致良知”。所谓致良知之说,“实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滴骨血”^[1](卷三十四)。“致良知”说不仅是阳明整个心学体系的主体,而且也构成了其养成理论的核心。从其整个养成理论来看,“致良知”不仅为“物”之“格”、“意”之“诚”、“心”之“正”、“身”之“修”提供了一个至善的标准,而且渗透于各环节展开的过程之中。王阳明对修身五环节的论述就是围绕“致良知”而展开的。在王学中,良知不仅是一般的先验道德意识,而且是人内心固有的封建道德准则,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五常”既是人固有的良知,又是判断是非的准则。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1](卷三)。这一论断,对于弘扬道德修养上的主体自决与自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既然人人皆具“良知”本体,人人都有先天的道德准则。那么,“恶”又从何而生呢?王阳明解释说,“良知”只是所谓未发之“中”的状态。“知无不良”^[1](卷二),“恶人之心,失其本体”^[1](卷一),良知仅是一种知善的能力。它还是一种自觉自主的能力。它与主观意志、情感、愿望等不同,是一种知的能力而非好之乐之的意向,因而易被物欲所蒙蔽、失其“未发之中”而发之偏倚。正因为如此,那种对良知之旨一悟全悟、彻上彻下的把握和顿悟,虽为他所追求和主张的至极之义,但他也明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不可能像圣人一样,做到纯心即当,凡动意念均与良知之体相合,往往一动念就偏离良知,使良知为私欲所蔽,世间才有了恶。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既然良知本身是不具备自觉向善的能力的,那又是什么东西促使主体自觉向善去恶的呢?背后似有他物。这一疑点王阳明并未给予解答,他的主观唯心论的道德论也无法给予解答。天赋的、本能的良知要转化为主体自觉的良知,使道德理性在心中凝聚,很关键的一个修养工夫就是“致”。他训释道:“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1](卷二十六)。“致”在王阳明这里有多重含义:开启、恢复、培育、扩充、躬行、实现等。王阳明提出了“省察克治”、“事上磨炼”等一套“致”的方法。这里,王阳明的“事上磨炼”虽还主要指主体意念的磨炼,但已触及主体践履与形成“良知”、“真知”的内在关联。

(3)关于“诚意”。所谓诚意,即“使意诚”,而要达

到“意诚”,就必须有真诚笃实的情意、情感。王阳明对道德养成中的情感因素的功用是十分重视的。他说:“君子之学以诚意为主。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1](卷四)。格物也好,致知也好,其间主体之心都应该是“真诚恻怛”的:“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1](卷二)。因此,真诚的道德情感对于格物致知至关重要、甚至是影响格物致知成败的关键。

朱熹的修养论以格物致知和持敬为主,对“诚意”的问题言之不详,而是格物致知以明天理,然后以此天理来约束人心,使人“敬”之“畏”之。这种外在强制性的庄肃诚意与王阳明的“真诚恻怛”、“诚爱恻怛”的发自内心的好感、爱感是大不相同的。在他的“天理”与“居敬”之间,缺乏的正是主体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真实的道德情感。为此,王阳明将“诚意”诠释为“着实去致良知”^[1](卷二)、“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1](卷一)。由王阳明阐释的诚意说,不仅解决了朱子所未能解决的认知主体向道德主体的转换,以及道德认知向道德践履转换过程中的难题,同时也使诚意说在阳明整个养成理论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4)关于“正心”。对于道德养成而言,主体道德认知、情感、意志乃是造就德性德行的可靠保证,道德意志则是把道德认知与情感转换成道德行为习惯的关键环节。在王阳明这里,道德意志问题即其“正心”。“正心”实际从“格物”已经开始,“格者,正也”,“物”者“心之物”,“格物”实为“正心”,此阶段“正心”(实称格物)是一种感性的初之“正心”。从初之“正心”到后之“正心”类似完成了道德意志与主体精神强化上升的一个螺旋。既然“正心”从“格物”已经开始,那么,由格物到致知、诚意、正心实是全程贯通合一的:“正心”的依据与内在标准当然是“良知”,“致良知”又是“正心”的内容和目的;“正心”同时是为了更坚定的“诚意”、执著于“诚意”。所以,“正心”的过程亦即主体道德自律、自觉为善过程的进一步强化,是道德理性已达行动意志的最高阶段。王阳明说:“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知”为格物致知,“充”、“遏”全是正心的意志努力。“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1](卷一)。“正心”之要全在于排除和抑制来自内与外的干扰和阻碍,正其心根,克除私意,努力向善。

(5)关于“修身”(“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还属于主体心理与观念的东西,而就道德养成言,仅仅停留于道德心理与观念阶段

是远远不够的。王阳明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志端矣,而功之弗继,是五谷之勿熟,弗如夷稗”^[1](卷七)。王阳明看到“行”对“成德”的意义,提出了有名的“知行合一”,这一命题也构成了王阳明养成理论的第五个环节——修身。知与行的关系,应该是从行(社会实践)开始,由行而知再到行,尔后不断往复以至无穷。而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是从主体之“知”开始而达行,他的“知行合一”命题有抹煞知与行的本质区别的倾向。然而,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其意义是在于道德养成,在修身论。王阳明时代,社会已面临深刻的道德危机:虽了解甚至口颂社会提倡的道德准则,却并不依照其行,或明知为社会道德准则所不容,却仍不顾道德而为之。王阳明疾呼:“此不是小病痛!”^[1](卷一)为了改变“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的道德尴尬,他要“指个真知行与人看”^[1](卷一)。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唯心主义知行观对养成理论的贡献和价值是有现代意义的。“知”是一个标志主观性的范畴,而“行”应该说有两层含义,王阳明一方面把“行”作“外在行动”使用,一方面又把“行”理解为“意动”的心理活动过程。当王阳明把“行”作“外在行动”使用时,“知行合一”就揭示出道德理性乃实践理性的本质意义,他强调“行”之真切笃实,乃是对“善之真”在于“行之实”的深刻触及,把“行”当作“意动”的心理行为过程,实际也是一种“精神实践”过程。所谓“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1](卷三)。即教人“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实是要求人们在体认天理良知的基础上,发念即善,这是对道德养成更高更严的要求。这一境界的养成更非一日之功,是需主体经过不断的修养、磨炼才能达到近乎圣贤的至善心理状态,其精微处见博大,细腻处显崇高,虽难,却仍为人类道德主观努力的方向。

总之,相对于《大学》原意,相对于程朱伦理,阳明心学的养成理论对修身五环节的探释更加深入、缜密,系统地论述了道德养成如何由知达情而达意而达修身的关系问题,不仅反映了道德养成的一般心理规律,同时也设计了一个合理而可行的道德养成机制。在道德养成的道德自律与践行方面,赋予了主体以巨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抓住了古往今来道德养成问题在理论上的重点和实践中的难点,也抓住了社会道德问题的症结。当然,王学伦理是因发现程朱理学体系缺少主体因素而转向心学的,因而特别强调人心的内在超越与提升的特殊重要性,从而使他把道德的主体因素抬高到超越一切并决定宇宙的地位,将道德的主体性变成了“唯一性”。因此,它

无以吸取现实的力量,也无法真正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实现善的创造价值,其内在主观的心性修养也因缺乏现实的依托而无力最终达成。我们只有把心学养成理论的前提颠倒过来,才能合理地解决些矛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完成对主观世界的改造。

二

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离不开人类伦理发展的丰富资料。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从社会实践出发,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现象的本质和特征,阐明了人类道德生活发展的法则。但是,关于道德的特殊性与主体性,道德之重乃在于主体的道德养成等等理论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的研究,对道德的特殊性与主体性等问题的探讨,有了较大的进展和深入。然而,仍缺乏从道德主体的内在心理机制来探讨道德养成的方法及途径的完备论述。王阳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家,他所酝酿、充实、提高而建立起来的养成理论,若撇开其封建内涵,就其理论建构而言,是相当缜密而精致的。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他的养成理论尚缺乏社会实践的理论前提,但他在主观方面、在道德心理机制方面对伦理理论是有所建树的。因此,对心学伦理的批判借鉴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宝库,对心学伦理的重新审视与创新,有助于我们建立和完善唯物史观的养成理论。

当今中国从总体上看,正处在步入信息时代的前沿,诸多由信息资本造成的社会问题与负面影响已波及中国。因此,阳明心学的养成理论对于促进社会主义中国的道德进步和人格健全,是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

(1)我们今天在进行道德修养、培养人格精神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格物”。我们今天讲“格物”,就是要投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用来源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五爱”标准去接触、观察和推究社会人生,接触、观察和推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道德事物与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中“公正”与“人道”等复杂的道义关系。

(2)我们的道德修养也需要在“格物”中“致知”。尽管社会主义主人之“知”不同于阳明封建伦理之“知”。但是,王阳明“行才知得真”的“致知”之说,启迪着我们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必须注重实行。社会主义主人,尤其是共产党人必须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在“做”中“致知”,在“做”中达人,在“做”中体悟身为主人的尊严、价值、责任及品格。当前,对于受社会主义教育多年的共产党人而言,问题的关键确已不是外在善恶规范的“知”之不明,而是一事当前“做”与“不做”的问题,是“真知”还是“伪知”的问题,是择善而从还是择恶同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今天,共产党人能不能做到“知行合一”的为人民服务,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成败乃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3) 道德的复杂性在于情感,道德的生命力也在于情感,培养真诚无妄的道德情感是我们进行道德修养的必经之途。道德主体的任何道德活动又都伴随着一定的道德情感。这种情感不是一般的心理情感,而是建立在道德理性之上的、执著于行的、至深的道德情感。不管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如何崇高,它们如果不能为人情感所体验,就不能真正成为道德行为的动力。在我国现阶段,社会成员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在对待职业道德生活和家庭道德生活时,都需要培养“诚实”、“诚恳”、“诚挚”、“诚信”等真诚无妄的道德情感,以此增进人际关系的和谐,消解或减少种种损害公共利益的不正之风,促进社会风气的良性发展。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更需培养较高层次的真诚为民的道德情感。真诚为民的道德情感的培养,是共产党人洁身自好的重要保障,对于当前我们战胜腐败顽疾,也显得至关重要。但从目前的腐败泛化看,除了外部体制的原因,如果从主体的角度看,则是为国为民的至诚情感缺乏或仍显不够,“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1](卷二十六)。只有培养对人民群众的至诚之爱,满怀精诚为民的至诚之心,“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1](卷一)。孜孜不倦地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共产党人才可能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尽现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

(4) 道德意志是道德主体作出道德决断,并使之付诸实践的能力,亦即阳明心学养成理论的“正心”。如果说道德认知更多地体现出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道德情感更多地体现出主体的道德自主与自愿,道德意志则更多地体现出主体的自责、自律、自立与自制。在道德主体践履笃行的过程中,无论是行动志向的确立,价值目标的选定,践履方式的抉择,笃行方案的制定,都伴随着人的意志因素。可以说,整个践履笃行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调整意志、坚定意志的过程。“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1](卷七)。道德意志是人类的道德心理由内向外转化的环节,是道德人格形成的关键。世界上最难的事,同时也是最管用、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管住自己。

管住自己,天下无敌。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可能不面对各种丑恶、腐朽的东西,这就进一步增加了道德选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需要我们磨炼道德意志的坚定、专一、自律与自制,“志苟坚定,则非笑诋毁,不足动摇,反皆为砥砺切磋之地矣”^[1](卷八)。此外,德法并举是现实社会的昌明之道,实行法治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发展大势。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法治又毕竟存在“治标不治本”的特点,它只能禁恶于已然,而难以绝恶于未萌。况且,只有发达的伦理素质才能造就公正的法官,只有尊重德性的社会,才能制定和执行普惠万民的公正法律,更何况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又还必须依赖于执法者的道德诚意和健康心志。要克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序、失范和反道败德的状况,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不能仅仅诉诸严法,更需培养社会主义主人的人格精神,建立和谐的社会伦理。这也是阳明心学养成理论大可借用于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的原因所在。

(5) 知、情、意的有机结合还并不具备外在的现实性,道德养成的落脚点在于道德行为习惯、品性的养成。第一,品性、习惯的养成,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必须经过长时期的、反复的“事上磨炼”、“省察克治”^[1](卷一)。无论是外在社会教育还是道德主体自修自养都应该遵从这一道德养成的规律。“义理无定在,无穷尽……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1](卷一)。道德养成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一个日益深化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注重“深入持久”、“常抓不懈”,“运动式”或“应景式”地走过场则难达教育之目的。个体道德修养亦应专心有恒、不达目的誓不休,“如此,方是精一功夫”^[1](卷三)。第二,品性、习惯的养成,还需要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严律己。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好色、好货、好名等私”^[1](卷一),也需要时时“扫除廓清”、“拔本塞源。”江泽民同志曾指出:“许多干部犯错误总是从量变到质变,开始往往有个缺口,但由于没有批评,任其所以,日积月累,最后铸成大错”。因此,只有不断地“痛省勇改”,不断地自我剖析、自我磨炼,才能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使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稳定化和系统化,并使之走向高度的统一,从而才能使外在道德的“当然之则”内化为主体的内心信念,达到道德选择的“自由”、“自如”,达到孔子所言“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化境”。

60年前,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讲到:共产党人“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

炼”,“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总之,要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好主观世界以利于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应该说,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观。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地强调思想修养的重要性。江泽民同志1997年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文中讲到:“一些学员和干部犯错误,包括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同思想上懒惰、不注意学习、不注意修养,是密切相关的……党执政了,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党员和干部同样要讲个人的修养。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大有重申和强调的必要”。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珍视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并用马克思主义整合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伦理思想,大力弘扬中华民

族独具特色的心性文明和养成理论,才能建树优良的社会道德。

[参 考 文 献]

- [1]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 江泽民. 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N]. 人民日报, 1997-05-16(A1版).
- [3] 朱熹.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 周公. 周易·系辞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5] 孟轲. 孟子[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 孔丘. 论语[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 [7] 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A]. 刘少奇选集:上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8] 陈楚佳. 现代伦理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严 真)

WANG Yang-ming's Hsin Hsuen Ausbildung Theory: Modern Value

XIA Shu-yu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ubei Three Gorges College, Yichang 443000,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A Shu-yun (1968-), femal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ubei Three Gorges College, majoring in ethics research.

Abstract: The kernel and essence of WANG Yang-ming's Hsin Hsueh lies in his ausbildung theory. H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perception, sensation, will and behavior of moral ausbildung and put forward a number of valuable viewpoints particularly on "the second half" of perception, realization and behavior of moral ausbildung. Therefore WANG Yang-ming's Hsin Hsueh ausbildung theory has an irrefragable modern value in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thical theory, especially in the Chinese socialist mo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ausbildung theory; modern value